

抗战 重庆往事

《苦干》传奇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匡丽娜 杨帆

1941年6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国土大片沦陷,沿海港口几乎全部丢失,没丢失的也被日本海军封锁,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此时,离“珍珠港事件”发生还有半年多时间,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仍保持中立,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国的抗战不了解也不关心。

但一部电影在纽约的上映,赢得了《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伦敦每日电讯报》、《生活》杂志等世界100多家知名媒体的关注、惊叹和好评,也改变了美国民众的态度。

《时代周刊》在6月14日的报道中称,“(片中)所看到的英勇和善良的中国人民,美国影迷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了解过。”“(该片)最后20分钟,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中,所有电影都没有能够拍摄到的令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场景。”

《纽约时报》6月24日的报道则称,“(重庆大轰炸)这样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所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大轰炸破坏。”

有媒体还透露,早在1941年元旦,美国罗斯福总统就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原本只有20分钟的播放时间,但电影开始后,总统先生取消了事先安排的活动,一直看完了整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苦干》(Kukan),一部时长85分钟,由一位对拍电影一无所知的美籍华人策划、资助,一位从未碰过摄影机的美国报纸记者兼夜班编辑在二次大战时的中国战区实地拍摄的彩色纪录片。

这位美籍华人就是李灵爱(Li Ling-Ai),一位出生于夏威夷的女作家、剧作家、舞蹈家。



奥斯卡获奖纪录片《苦干》。



历经千难万险,四处中国拍摄

《苦干》是这样诞生的

李灵爱,1908年生,父亲李启麟是夏威夷名医,曾与孙中山是同学,在当地创办了明伦中文学校;母亲江录音是一名产科医生。在明伦学校,她学习了语言、舞蹈和音乐等知识与技能。此后,她还曾就读于夏威夷名校——私立的“普纳荷”(Punahou,也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校),是班上唯一的中国女生。

作为一名特立独行、时髦、走在时代前沿的女性,李灵爱深受父亲影响,希望中国富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目睹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满怀热忱的李灵爱,一心想着报国、救国。为此,她参加过在纽约的美国援华联合会募款时装表演,还接受过飞机驾驶训练,有意驾驶轰炸机前往中国协助作战。

一天,她遇到一家报社的记者兼夜班编辑雷伊·斯科特(Rey Scott)。

“星期五就有船,你到中国去拍一部有关中国抗战的纪录片吧!”李灵爱对斯科特说。斯科特摇摇头,没有答应。

“虽然我是一个黄皮肤女人,但你内心却是一个胆小鬼!”李灵爱使出激将法。

“谁说的,去就去!”斯科特“接招”。

李灵爱动员祖母变卖了首饰,凑集拍摄资金。在她资助下,从1937年到1940年,斯科特扛着一台16毫米摄影机,历经千难万险,四处中国。在那段战火漫天的年代,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行程长达三万多里。

他用电影胶片忠实记录了抗战前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被战火焚烧的上海、南京、广东;上百万中国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日本军队使用机关枪对付中国人民的情形;行军部队和游击队突袭要寨;刚刚被日机炸毁,几乎在硝烟散尽前就已修复的滇越公路;在战时首都重庆,人们一次又一次扑灭轰炸带来的大火;从西南到西北,大后方军民对抗胜利的韧性坚持与直面战争的从容淡定……当时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也在片中入镜。

为此,他们坐过飞机,开过卡车,乘过渡船,搭过火车,甚至还骑过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斯科特便是骑着马,走上了340步石梯。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飞机1940年8月19日至20日轰炸重庆时,斯科特在美国大使馆拍下了日军出动37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半个小时内向渝中半岛扔下200吨炸弹和燃烧弹,屠杀千余人的重庆居民的血泪罪行。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由西方人拍摄的最为完整系统揭露日军轰炸重庆的珍贵电影档案。



李灵爱在九名儿女中排行第六。她的两名兄长和一名姐姐都是医生。



2009年底,罗宾龙在美国佐治亚州找到《苦干》拷贝。



奇怪!

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人间蒸发”了

1941年,《苦干》在纽约首映,引起巨大轰动。当时的西方,没多少人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而这部影片,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了解到那里的人民正在单独顽强地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作为整部影片的最高潮,那场总长17分34秒的重庆大轰炸,以及轰炸后的抢救,更让西方人知道了重

庆——这座炸不垮的城市。

在观看了这部电影后不久,罗斯福曾亲笔题写卷轴赠予重庆,“以表彰吾人钦佩该城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城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世界而不朽。”

一时间,这部影片被许多团体用作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筹款的宣传工具,中国开始收到源源不断的外援,一些美国青年看到该片后报名参加了飞虎队,投入到中国抗战中。

1942年,奥斯卡电影奖首次设立纪录片奖,《苦干》摄影师因为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的影片”而荣获特别奖。

但奇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苦干》这部影片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不但再没被放映过,甚至奥斯卡电影学院的档案库中也没有文字记载,而没有影片收藏,它被注明为“遗失的影片”。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下了喜悦的泪水。那么,在美国失而复得的《苦干》又是怎么漂洋过海来到重庆的呢?

原来,在《寻找〈苦干〉》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罗宾龙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找到一位中国抗战历史研究专家,求证这部片子的价值?她把苦恼告诉了好友李丹柯教授——位曾在中国四川大学任教,现已定居美国,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妇女历史的学者。

“这不难,我的一位中国学生肯定能帮到你。”李丹柯告诉罗宾龙,自己可以帮忙。

这名中国学生就是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30多年前,周勇就读四川大学历史系时,李丹柯曾教过他古希腊罗马史。如今,周勇早已是知名的抗战史专家,曾带领他的团队,到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和台湾等地,开展学术交流,搜寻抗战大后方历史资料,成果丰硕。

经李丹柯牵线,罗宾龙很快和周勇取得了联系。7月28日,周勇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主持了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学术研讨会,罗宾龙和她经过千辛万苦找到的《苦干》第一次在中国亮相。

罗宾龙对周勇进行了专访。周勇说,这部由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没有偏见,着眼于反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的。作者对中国人怀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敬意,是美国人“良心”的体现。该片为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世界的同情与尊重。周勇还对李灵爱、斯科特赞赏有加:“我为李灵爱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也佩服她的勇气和毅力,体现了中国人的自强不息。”“斯科特有良心、有责任感、有冒险和创新精神,是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罗宾龙和《苦干》找到知音。



1941年1月1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白宫观看了该影片。



罗宾龙所发现的现有版本是至今唯一留存版本。

本版图片由记者熊明翻拍



寻找《苦干》

失而复得的《苦干》漂洋过海来到重庆

“《苦干》没有在中国放映过。或许,政治因素是导致这部影片几乎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这句话的是另一位美籍华人罗宾龙(Robin Lung)女士。在《苦干》销声匿迹近70年后,经过不懈追寻,她最终找到了这部传奇性的影片。

与李灵爱一样,罗宾龙也在夏威夷出生长大。喜爱阅读的她,有一次读到了李灵爱的传记《生命是长久的》(Life Is For A Long Time),书中提到了《苦干》。

作为电影制片人的罗宾龙,长期以来有一个愿望——想拍一名华裔成功女性的故事。而李灵爱不仅是一名华裔,还是一名来自夏威夷地区的女性。这让她欣喜若狂。

但进一步搜寻的结果却让她惊讶。一部得奖影片为什么会消失?这极大地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决定深挖到底,同时拍摄一部名为《寻找〈苦干〉》(Finding KUKAN)的纪录片。

她先是遍访李灵爱亲友。从对他们的访谈,以及留下来的东西中,她逐渐了解了李灵爱。

接着,她开始寻访斯科特的后人,希望探求到更多与《苦干》有关的故事。一开始,

她不知从何下手。后来她从从文中得知,斯科特安葬在乔治亚州。于是,她从脸书上找到斯科特的儿子,但没有把握对方是否会联络她。当对方打电话给她的那一刻,她内心的喜悦无法形容。

更让罗宾龙开心的是,斯科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手中有一部90分钟完整的《苦干》拷贝。而在此之前,她只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苦干》30分钟的片断。

然而,2009年,当罗宾龙喜出望外地拿到90分钟的《苦干》拷贝时,却发现,这部纪录片已经严重破损。罗宾龙把它送到奥斯卡电影学院,设法修复。

对此,奥斯卡电影学院也如获至宝,因为他们因缺乏《苦干》影片收藏,早在6年前,便贴出通告,四处征寻《苦干》的拷贝。

经过3年修复,《苦干》基本成型,结合此前罗宾龙找到的30分钟的片断,85分钟的完整版《苦干》得见天日。

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龙还与斯科特的孙女取得了联系。后者是一位画家,在家里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很多祖父留下来的与《苦干》有关的照片、文字资料与纪录片。她正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并以此作画,希望通过她的画笔,把这段历史拼接起来。当罗宾龙看到斯科特孙女那些反映抗战期间中国民众生活凄惨状况的画作时,感到非常亲切,更感到有人是真正了解她拍摄的纪录片,因此流

特别鸣谢:本专题由本报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共同策划。为了这次成功的合作与交流,程武彦、潘涛、黄晓东、刘志平、张克雷、周昌文、郭斌、张宋英、艾智科等,在翻译、协调、安排等方面,付出了许多辛劳,特此致谢。



抗战 重庆往事

《苦干》经典镜头

人物专访

《苦干》与《红星照耀中国》 「帮助中国赢得了世界」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专家简介：刘志平，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重庆中国抗战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记者：前不久的研讨会上，你的一部在中国闻所未闻的纪录片——李灵爱与雷伊·斯科特的《苦干》，与举世公认、史诗般的经典巨著——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相提并论，为什么？

刘志平：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全民抗战。《苦干》反映了1937到1940年国统区军民坚持抗战、决不屈服的真实状况，而《红星照耀中国》反映的是1936年6月到10月陕甘苏区（后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军民誓死抗战、决不屈服的意志和精神风貌。两部作品呈献给了人们关于中国军民“全民抗战”的“美国人解读”。这既是巧合，但更是必然。两部作品都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抗战中国，因此，更显客观和公允。

李灵爱、斯科特与斯诺，他们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先后踏上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李灵爱始于对中国的挚爱与献身，斯诺始于内心的疑问与探索，当他们目睹“一座座新的长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巨大的勇气”时被深深打动，他们用敬佩的眼光看中国，用返家的笔调书写中国，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帮助中国赢得了世界。

记者：《苦干》与《红星照耀中国》有什么相同与不同点？

刘志平：《苦干》展现的是国统区军民的坚韧抵抗。他们用真实的镜头告诉人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角落都有抵抗侵略的人们，在这些史诗般的战斗中，站在最前线的是中国奇迹。”

中国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人们勤劳、善良，但也十分勇敢。当外敌人侵时，最谦卑的工人和农民迅速变成了领土的捍卫者，他们在中国的新长城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有一种与生俱来、永不屈服的敌人——“苦干”。一个貌似孱弱的国家，面对如此强悍的敌人能够持久抵抗，其关键是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苦干》的旁白说得好：“没有胜利，他们宁可不要和平。”

如果说李灵爱和斯科特是用镜头记录了国统区和沦陷区军民的坚韧抵抗，那么，斯诺则是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抗战初期陕甘苏区军民誓死抗战的坚定意志和精神风貌。

1936年10月，斯诺冒着炮火辗转回到北平。作为第一个深入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他撰写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长篇通讯，之后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他向陕甘苏区以外，尤其是西方世界报道了日本铁蹄下红色中国的一切：“红军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的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等等。斯诺告诉世人：“中国农民占红军的大部分，他们坚忍不屈，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两部作品的相同之处则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同样的事实——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及其不可战胜的苦干精神和坚定意志。

记者：如何评价两者所起到的作用？

刘志平：1941年《苦干》在纽约世界剧场首映，立即获得一片赞叹和好评。100多家著名媒体刊登了评论文章以及照片。当时西方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正是该片的放映直接推动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援助。

而《红星照耀中国》面世后，先后有近20种文字翻译出版，红色中国及其抗战景象传遍了世界。特别有意思的是，1941年，已经回到美国的斯诺也观看了《苦干》，他称赞该片说：“这部影片以无与伦比的质量和叙事手法，描述了一个国家重生所处的恶劣环境，讲述了这个民族在苦难中痛苦挣扎并获得新生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匡丽娜 杨帆



镜头一

在日军1940年8月19-20日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前，防空人员在高处悬挂起红球预警。人们带着小板凳和随身小包，从容不迫地找防空洞躲避。大街上，一位穿着蓝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着太阳伞，一脸镇静地往防空洞走。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电梯，向南岸转移。

解读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战时首都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对象。重庆大轰炸研究专家、西南大学教授潘涛告诉记者，当时

重庆防空司令部规定：悬红色球1个，表示敌机有空袭本市动向，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红色球2个，表示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进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

“红球台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市内如小什字的美丰银行顶楼、纯阳洞、李园、虎头岩等处，都是悬挂之地。如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渝中区文化宫附近），可见影响之深。”红岩联线研究人员丁英顺介绍。

警报出现后，市民们有水路和陆路两种选择。走水路，可乘坐轮渡、木船，过长江上山躲避；或者顺流而下，到溉湖等地方躲避。走陆路，则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警报一响，小轿车、客车、人力车挤在一起，人喊马叫。有时，人们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



镜头二

重庆街头不乏穿着时髦的女性，镜头前，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正兴致勃勃地在打网球。

解读

抗战爆发前，重庆市民的服饰多沿袭清末民初旧装。男士内穿短袖，外穿右襟长衫，喜欢蓝、青、灰三色。未婚女子多蓄长发，扎红绳；已婚女子则挽发髻，佩耳坠、戴玉镯。

“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后，外来人口的迁入，给山城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丁英顺说，当时，重庆市民纷纷效仿，男子脱了长袍马褂，穿上了兴起的中山装与西服，戴起了礼帽。女性穿起了西式改良旗袍，着皮鞋长裙，理齐耳短发，并抹口红、涂香脂、烫头发。

“山城的餐饮业也有了新变化。”那时在山城，除了火锅，还能买到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的辣子鸡、北京的烤鸭等风味佳肴。西式餐厅、咖啡厅也迅速发展。抗战初期，重庆的西餐厅只有5家，到1943年已增至30余家。

在饮食习惯方面，市民由以往一天两顿干饭（即上午10点为吃“上午”，下午4点为吃“下午”），渐变为一天两顿，并由蒸居蒸饭改为饭锅煮饭。

“一些时髦的西式娱乐也渐渐在山城流行起来。”当时诸如滑冰、摄影等都较受市民欢迎。那时的滑冰场一般都在公园内，门票低廉。一到周末，许多年轻人自带滑冰鞋，围聚在滑冰场上嬉笑打闹。

“一旦听到警报，人们就快速跑进防空洞；警报解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就工作，该读书就读书。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丁英顺感叹说。



镜头三

斯科特骑着一匹马从朝天门码头，沿着石梯往上走。画面中，骑在马背上的他既紧张又兴奋。画面解说词为：“重庆，中国战时的中心，一座修建于山丘和峭壁上的城市。据说从码头要走三百步才能抵达重庆城，我数了数，其实是340步。”

解读

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王志昆介绍，重庆依山而建，地势高低不平，交通发展难度大，旧时的运输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轿子、独轮车、人力车、马车、小木船等。重庆人力车夫、抬轿子的滑竿师傅，及拉船的纤夫统称为“棒棒”。

国民政府迁重庆后，山城的街头出现了许多私人小汽车，江上也开通了供人乘坐的过江小火轮，重庆的交通运输有了较大改善。1940年，公共汽车由1933年的1辆增加至90辆，行车线路也由一路增加到三路，还开通了缆车线路。1941年，营业汽车72辆，自用汽车106辆，自用货车4辆，方便了人们出行。



镜头四

在战时儿童保育院，一群年龄大小不同的孩子在一起洗澡、洗头、吃饭、睡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用一双大眼睛，一直好奇地盯着摄影机看。

解读

抗战时，众多儿童流离失所，吃穿无着。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保育分会，办起了保育机构，救助儿童。

原合川国民党地方志办公室的蒋雅彦在《烽火摇篮——战时儿童保育院》一文中称，当时，20余个保育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全国大后方，其中重庆至少有12所。以一所每月收容儿童500人计算，保育会总计收容儿童3万多人。

该文还称，因为国难当头，保育院不是办在庙宇里，就是办在家祠中。教职人员有的只有微薄的薪水，有的“一席两职”（即两个职位只有一席薪水），有的则是只管饭不给工资，甚至还有是兼职教学，教了书不领任何报酬，纯属义务。

进入保育院后，孩子们所上的文化课大多与外面的小学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知识。老师们还对孩子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唱《保育院院歌》、《大进行曲》等。

1939年1月，《新华日报》记者回采实地采访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又称歌乐山保育院），称其为“三千尺上的自由天地”——“孩子们自己办壁报、图书馆；开了小公园，养了兔子、小羊、鸭子、鸽子，每天轮流管理。”

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例如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杨嘉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级画家任冰端、地貌专家蔡国元等。

有因此挫伤。

当时市区的一面墙上，写着“愈炸愈强”的标语。“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没有解除就加紧检修水电设施；校舍厂房被炸毁了，广大师生和工友们随修随修。新壁架起，机器隆隆作响，读书声朗朗入耳。”

在轰炸中，重庆各界人士亲如兄弟姊妹。潘涛介绍，当时在一些背街小巷，由于停电路黑，家家门口都点着“太平灯”（煤油灯），以便行人。

饱受空袭的重庆人民，还化悲痛为力量，在1940年的全国春抗劳军运动中，市民踊跃捐款，捐款数占全国总数的75%；在1941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的“一元献敌机运动”中，重庆各界共募集到150余万元。

与此同时，重庆文艺界还利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淡季（这一时期经常大雪路漫，不利飞机空袭），举行大规模演出，统称“露天公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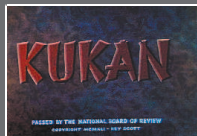
“重庆人民用坚强不屈的精神，筑起了一座炸不垮的城市！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传颂、发扬。”潘涛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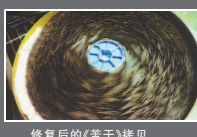
李灵爱曾在 Punahou 中学就读，50年后奥巴马亦毕业于同一所中学。



在李灵爱的帮助下，雷伊·斯科特于1938年重返中国。



《苦干》片头。



修复后的《苦干》拷贝。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孩子。（本报资料图片）



7月28日，观看《苦干》后的专家在进行讨论。



7月28日，观看《苦干》的学术研讨会现场。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熊明摄影、翻拍



抗战·重庆往事

《苦干》三问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匡丽娜 杨帆



《苦干》海报。



1945年3月29日，重庆南山空军墓园远景，近为公祭现场执勤的中国士兵。

“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击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抗敌，时刻创造着奇迹。”

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摘自《苦干》解说词

1问 《苦干》片名是谁取的？

1941年6月15日,《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一个奇迹的报道》一文中称,“林语堂曾给《苦干》取了名字,苦干意味着‘少说多干’。”

同年7月24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指出,“《苦干》的主题曾被林语堂描述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勇气和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这是新的中国长城。”

2问 《苦干》有什么不一样？

“该片是日军侵华的新铁证。”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说,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记录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时间最准确,史料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影像原始资料。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像资料,绝大部分摄于日军轰炸机上,多为投弹情景,其他影像比较零散。《苦干》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战区实地拍摄,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等等,均可勘对,铁证如山,是西方客观记录日军轰炸重庆不可多得的证据。由于该片获得奥斯卡电影纪录片特别奖,更具有

强大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周勇说,摄影师可能拍摄过重庆大街上尸横遍野的悲惨场面,可他们最终没有选择把这些画面放在影片里。出现在影片中的只有一具尸体。它向我们更多地展现的是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坚强、坚韧、不屈与执着。这样的呈现,同样真实惨烈,震撼心灵,难以忘怀。正如解说词所说这就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这既为当时的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也为今天的中国抗战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3问 《苦干》为何不为中国人所知？

“《苦干》更多的是反映中国老百姓的战时生活,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因此美国人可能认为这部片子在中国不具有商业价值,所以当时就没在中国放映。”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潘海教授推测。

“在我所接触过的影片中并没有《苦干》,这可能与其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唐吉教授称,在那个年代,纪录片一般

不会进院线,最多只在商业影片放映前的空隙放映一小段,所以没有机会完整展现。当时,中国拍摄的纪录片也曾在美国上映,但都是由外交官带到美国去的。从美国回来的,一般不会想到把纪录片带回来,所以《苦干》没能在重庆上映。

重庆图书馆文献专家王志昆则认为,或许战争让中美双

方无暇顾及文化交流,《苦干》就没有机会在中国上映。“尤其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不满,美国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是‘烂泥糊不上墙’,《苦干》这部片子也因此而沉沦。”

周勇教授的推测是:《苦干》的销声匿迹,可能与西方在战后有意“遗忘”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有关,“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如哈佛大学汉学院的彭柯教授就认为,由于东方很多地方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所以,对于殖民地的话题,西方主流社会往往会有所回避。”

周勇教授说,《苦干》的销声匿迹,可能与西方在战后有意“遗忘”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有关,“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如哈佛大学汉学院的彭柯教授就认为,由于东方很多地方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所以,对于殖民地的话题,西方主流社会往往会有所回避。”

方无暇顾及文化交流,《苦干》就没有机会在中国上映。“尤其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腐败独裁,引发了美国社会的不满,美国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是‘烂泥糊不上墙’,《苦干》这部片子也因此而沉沦。”

周勇教授的推测是:《苦干》的销声匿迹,可能与西方在战后有意“遗忘”中国的抗日战争史有关,“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如哈佛大学汉学院的彭柯教授就认为,由于东方很多地方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所以,对于殖民地的话题,西方主流社会往往会有所回避。”

人物专访

罗宾龙:

我为什么要拍《寻找〈苦干〉》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匡丽娜 杨帆

一个连汉语已经不会说的美籍华人,为什么对一部70多年前的抗战纪录片如此感兴趣?她想通过《寻找〈苦干〉》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对此,记者采访了纪录片《苦干》的发现者、美籍华人制片人罗宾龙女士。

记者:我们看到,《寻找〈苦干〉》预告片的开头,您自述,儿时希望做拥有一头金发的美国女孩儿。为什么后来却努力寻找《苦干》,寻找这样一部由华裔女性主导拍摄,反映中国人抗战历史的影片?

罗宾龙:我希望做一个金发美国女孩儿,并不因为中国女性不好,或者不值得尊重,而是因为美国媒体常常报道那些外形俊俏的明星,就像芭比娃娃一样漂亮。所以小时候,我自己也想做那样的人。

大学期间,我学习了很多关于电视、电影的知识,并接受相关训练。14年前,我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制作一些特别的电影,尤其是关于那些尚未为人所知的女英雄。

我从事了两部电影的拍摄,此后,我还想描写一个来自夏威夷地区的女性,而她最好和我一样是一名华裔,这就是我去寻找这样一位中国女性的原因。

当我找到李灵爱和她制作的彩色纪录片《苦干》之后,她的故事让我十分钦佩,所以我想还原这样一个女英雄。

记者:您是怎样找到李灵爱的,在寻找的过程中,什么事给您留下过深刻印象?

罗宾龙:寻找的过程很有趣。我记得,自己曾在好莱坞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试图从他们身上去获得答案——谁是他们熟悉的华裔成功女性。其实,我和他们一样,对此知之甚少。但峰回路转,这源于我在纽约的一个朋友。我和她都很喜

欢悬疑推理小说。她告诉我,有一本创作于1940年的小说,描写了一位中国女侦探,她有完美的个性,独立、智慧而性感,生活在夏威夷和纽约。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女性并非虚构,而是建立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之上。这个人就是李灵爱。我想,我应该找到这位真实的女性,了解她有趣和独特的个性。同时,我还发现李灵爱竟然拍摄了《苦干》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此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李灵爱这个名字,也从没有听说过李灵爱的故事。在发现李灵爱之前,我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但是,李灵爱却从不这样认为,在她眼里,中国人是高尚的,她始终以此为荣。

记者:您在纪录片《寻找〈苦干〉》中有一段关于李灵爱的采访片段,您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资料的?

罗宾龙:那是在1993年拍摄的电视节目采访片段。那一年,李灵爱85岁。那个采访约两个小时,通过寻找,我拿到了那盘磁带。采访中,李灵爱十分健谈,她一直在谈论她自己,她还聊起了自己去白宫为罗斯福放电影的经历,讲述她怎么去的白宫,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以及说了些什么,也谈论她到中国的经历,包括她玩空竹的经历等等。

记者:您寻找《苦干》的目的是什么,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告诉世人什么?

罗宾龙:我希望向美国人和其他人展示,李灵爱应当被记住,应当受到尊重。当我找到影片后,发现它与一段重要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在美国,这部影片所提及历史和故事已被遗忘,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美国携手作战。

因此,我想,让《苦干》重回人们的视野,让大家去了解那

段峥嵘岁月,了解当时的亚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解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世界知道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肩作战。

记者:您觉得自己和李灵爱有什么相似之处?

罗宾龙:(笑)我想,首先应该是勇气吧。她教会了我坚持,我和她都是来自夏威夷的中国女性,我们都努力去拍摄一部影片,试图向世人展示一段重要的历史,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这段历史。在我看来,我们都不是为了名利而去去做这些事情,而是为了用电影去感动更多的人,感化更多的人,教育更多的人。

此外,我和她还有共同的理想——成为杰出的艺术家。李灵爱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正是李灵爱的传奇经历激励着我,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成为艺术家,成为电影制作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不一定是为了获得奖项,而是让自己从事的事业对未来有深远影响。

记者:近年来,我们听到一些日本领导人不断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中国、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在此背景下,你把《苦干》重新带回观众的视野,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

罗宾龙:我想,我们把《苦干》带回来,是希望带给人们和平与和解,而不是重新挑起中日之间、中日人民之间的争斗与仇恨。影片能够带给美国人更多真实的画面,美国曾有人疑问,日本究竟对这座城市做了什么?真的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吗?我想,在看了影片后,会有更多人去正确地认识和接受真实的历史事实。战争不仅是对政治和军队的破坏,更是对普通人的伤害。我希望,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能珍惜和平,不要让战争破坏他们的国家,伤害他们的生活。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罗宾龙:我希望在明年完成《寻找〈苦干〉》这部纪录片,希望影片能够在美国的电视和广播中播出,当然也希望能够在其他国家播出。接下来,我希望能参加一些电影节等活动,我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对《寻找〈苦干〉》这部影片有兴趣。



纪录片《苦干》的发现者、美籍华人罗宾龙(Robin Lung)女士。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摄影、翻拍

